

《三国史记》的历史影响探析

苗威

(延边大学 人文学院历史系, 延吉 133002)

摘要:《三国史记》是朝鲜第一部官修正史,是研究朝鲜半岛三国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近年来,随着东北亚古史研究的深入,学界对于《三国史记》非常关注,然而对其历史影响则鲜有系统论述。准确、客观地认识其相关记载,无论对于朝鲜史,还是古代中朝关系都具有积极意义。文章认为,《三国史记》在编纂方法上对朝鲜史学界的影响非常深远;同时,其中的错误记载也对后世的历史研究形成误导,其将高句丽、百济、新罗并列于朝鲜国史之中,也对后世的历史认识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三国史记》;金富轼;历史影响

中图分类号: K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09)01-0033-06

《三国史记》是金富轼奉高丽仁宗之命纂修的一部汉文史书,成书于公元1145年(高丽仁宗十三年,南宋绍兴十五年),是朝鲜的第一部纪传体正史。该书依照中国正史的编纂体例,由本纪、年表、志、列传四部分构成。近年来,随着东北亚古史研究的深入,学界对于《三国史记》非常关注,征引频繁。围绕《三国史记》,从史料的虚实^[1-3]、史料价值^[4]、系年的真伪^[5,6]、史笔的方法^[7],到对《三国史记》进行综合研究^[8,9],成果较众。然而关于《三国史记》对于后世的历史影响则鲜有系统论述,笔者欲以此文,就教于方家。

一、《三国史记》的历史编纂方法对后世的影响

《三国史记》是朝鲜半岛现存的第一部官修正史,在朝鲜古代史学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为其古史的修撰树立了楷模。金富轼之前,朝鲜半岛虽然有诸如《古记》之类的新罗、百济人的历史记载,但是并未留传下来,即使偶有片段性的史录传世,也不成系统。另外,金富轼在撰写《三国史记》之前虽然撰写过高丽《睿宗实录》和《仁宗实录》,但原文同样也并未流传下来。因此,《三国史记》在朝鲜史学史中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

(1)金富轼之后的史学家在撰写史书时都或多或少地吸取了金富轼的经验。继《三国史记》之后一个半世纪,于公元13世纪晚期,高丽和尚一然撰写了《三国遗事》。顾名思义,《三国遗事》与《三国史记》同写“三国”的历史,不过前者是对后者的重要补充。一然在写书之前,无疑熟读了《三国史记》,在史料收集乃至写作过程中,《三国史记》当是其不可或缺的

重要参考资料,其原因有三:其一,从《三国遗事》对历史的叙述来看,一然吸收并借鉴了金富轼的古史认识体系,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在金富轼涉及到箕氏朝鲜、卫氏朝鲜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檀君朝鲜,加强了朝鲜半岛祖先崇拜的“本土化”倾向。金富轼在《三国史记·年表》中曾说:“海东有国家久矣!自箕子受封于周室,卫满僭号于汉初,年代绵邈,文字疏略,固莫得详焉。”^[10]一然对箕子受封、卫满僭号之说并未否认,更进一步将檀君神话纳入到历史范畴,提出“三朝鲜”说^[11],这种认识到现在仍有余绪,影响深远。其二,一然继承了金富轼的“新罗中心”史观。从《三国遗事》的内容看,虽然也涉及到了古朝鲜、三韩、乐浪、带方、扶余、高句丽、百济、靺鞨等,但主要的篇幅还是记述新罗的历史和文化。其三,《三国遗事》中有相当一部分记事与《三国史记》相同,证明一然采用了金富轼书中的某些史料。当然,《三国遗事》与《三国史记》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史书,它不是纪传体正史,亦非官修,属个人述史范畴。

《三国史记》之后,直到15世纪,郑麟趾领衔编就《高丽史》,朝鲜正史方在《三国史记》之后有后继之作。从该书的内容及体例看,它在很多方面对《三国史记》有所继承:一是继承了《三国史记》的本土思想,在此基础上又增强了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二是继承了金富轼的“事大”史观,始终在宗藩关系的框架之内叙述高丽同中国的关系;三是采取了纪传体的体例。关于“事大”史观,郑麟趾与金富轼相比,似乎更为突出一些,其中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他将国王的本纪改称为“世家”,体现了宗藩关系中严格的君

收稿日期:2008-07-0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7JA770028)

作者简介:苗威(1968—),女,教授,博士。E-mail:miaowei68@yahoo.com.cn

臣名份。至于体例方面,《高丽史》是经过反复讨论才最后确定下来的。当然,《高丽史》从内容到形式,要比《三国史记》更为详尽和完备。《高丽史》的内容是分为世家、志、表、列传等部分撰写的,与《三国史记》相比,内容丰富了许多。“世家”的写法与本纪并无太多差异,即采取编年体的形式,记载历代国王的生平事迹,其“史论”部分称为“史臣赞曰”,并一律置于各代王之世家结尾处。“志”是记载王朝典章制度的部分,《三国史记》仅有祭祀、乐、色服、车骑、器用、屋舍、地理、职官等,而《高丽史》除了地理志、礼志、乐志、舆服志、百官志外,尚有天文志、历志、五行志、选举志、食货志、兵志、刑志等。其中地理志是从“三国”开始叙述的,很多内容采用了《三国史记》的资料。“年表”综合采纳了《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的手法,以世家编年为线索,上有干支纪年,中有中国皇帝的年号,下为高丽国王在位的年代,大事内容分别记入年号和年代之下。“列传”是历史人物的传记,在这方面《高丽史》与《三国史记》并无太多区别,但前者吸取了自《史记》到《元史》诸中国正史的经验,对人物的传记进行了详细分类,所特别者,是将辛禡、辛昌两代国王置于列传的叛逆类中,而不置于世家之列。

(2)《三国史记》所保留下来的史料,是研究朝鲜半岛历史、中国东北地方史、中韩古代关系史的重要依据。尽管自《史记》开始,中国历代正史都曾为东北亚古族古国专门立传,其中大多包括新罗、高句丽、百济,中国古文献虽说宝贵,但并不能完全替代朝鲜半岛流传下来的资料。就三国的王系来说,本来应该是了解三国历史的基本线索,但在中国相关史书中缺乏完整性与系统性,屡有缺漏和误载,而《三国史记》虽然也存在类似问题^①,不过相比于中国正史而言,已经非常完备而且系统,其中的一些记载虽仍然存在不实或欠妥当的地方,但毕竟弥补了中国文献的缺陷或不足,使后人对三国历史在宏观上有明确的认识。同时,对于许多问题,在微观上也给我们提供了相当宝贵的知识和信息,这对研究三国的诞生、发展乃至灭亡,是不可替代的,对探讨东北亚古代民族的产生及其变迁提供了弥足珍贵、不可多得的史料。可以说,《三国史记》带有百科全书的性质,这不仅对于了解东北亚古族古国的历史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对了解彼时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也是相当重要的。

(3)《三国史记》同所有的史学著作一样,体现了

鉴戒作用。金富轼世界观的主流是儒家思想,这种思想在书中体现得颇为充分,儒家所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都是为维护统治秩序和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但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却在古代建立清明的政治、维护社会安定、讲究人类文明、保持正常的人际关系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有些人在批评金富轼及其所撰《三国史记》时总是在“民族自主性”上做文章,但事实上,《三国史记》是在高丽人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高涨时期的产物,如果说它抹杀了其民族自主性,无论从事实上还是逻辑上,是讲不通的。金富轼是新罗人的后裔,高丽王朝是从新罗脱胎而出的新政权,高丽人在评价高句丽与新罗之间的种种是非时,总是站在新罗这一边,如果让王氏高丽人站在高句丽的立场说话,那就是不可思议的了。至于高丽人打着高句丽的幌子同契丹人、女真人争是非,则另当别论。在国际关系方面,在涉及唐、罗冲突的记载中,我们看得到金富轼对于新罗的感情,他之所以将《金庾信传》的篇幅写得较长,所体现的就是一种民族自主精神,金富轼不否认是唐军打败了影响新罗生存和发展的两个主要敌人,在新罗与唐朝的交往中,新罗是受益的,因此,即使他在记述唐罗战争时,从来不用“贼”这样贬义的字眼。另外,在现存《高丽史》的《仁宗世家》结尾处有一段金富轼的“史臣赞曰”,其中有几句评论仁宗处理国际关系的话颇令人玩味:“及金国暴兴,排众议,上表称臣,礼接北使甚恭,故北人无不爱敬,词臣应制,或称北朝为‘胡狄’,则霍然曰:‘安有臣事大国,而慢称如是也!’遂能世结欢盟,边境无虞。”金富轼本人的为人,在徐兢的《高丽图经》中有明确的记载^②。应当说,金富轼及其所撰的正史,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的教益。

二、《三国史记》中的错误记载对后人的误导

《三国史记》的积极影响并不能掩盖其所存在的负面因素。《三国史记》对一些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记载存在不真实的情况,而这些问题存在,无疑为后人认识客观历史造成了障碍,严重地误导了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工作,致使人们对相关历史难以有准确的了解,甚至产生误解。

(1)金富轼对于有些史料不加辨析地“拿来”,并实录于书中,不仅误导了古代学者,而且也为近、现代非学术性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依据,从而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对古人的影响,我们还是以《三国

^①比如对于宫、遂成、伯固三代高句丽王的关系,《后汉书》将其看成是父子相传,《三国志》则漏记了遂成,而《三国史记》则将三人记为兄弟相继。又比如对于男武、伊夷谟、位宫三代高句丽王,《三国志》仅记有伊夷谟与位宫,而漏记男武,其所云之“伯固死,有二子,长子拔奇,小子伊夷谟”,亦有错误。若依《三国史记》所记,伯固当有四个儿子,即长子男武,次子发奇,三子伊夷谟,四子鬲须。但《三国史记》却又将男武同伊夷谟相提并论,并将《三国志》的相关记事插入其中,造成“张冠李戴”的弊病。

遗事》为例来进行说明。在《三国史记·崔致远传》中引述了崔致远文集中《上大师侍中状》中的一段话：

伏闻东海之外有三国，其名马韩、卞韩、辰韩，马韩则高丽，卞韩则百济、辰韩则新罗也。高丽、百济全盛之时，强兵百万，南侵吴越，北挠幽燕齐鲁，为中国巨蠹^{[6]527}。

由于崔致远是新罗时期的名人，并在中国生活过较长时间，其相关认识在人们的眼里颇具权威性，兼之金富轼在《三国史记》中专门为其立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他的生平事迹，更加提高了崔致远地位，因此崔致远的说法人们往往奉为圭臬。例如，一然在《三国遗事》中亦引用了崔致远的话：“马韩，丽也；辰韩，罗也。”接着就自注云：据《本纪》（指《三国史记》本纪），则罗先起甲子，丽后起甲申，而此云者，以王准言之耳。以此知东明之起，已并马韩而因之矣，故称丽为马韩。今人或认金马山，以马韩为百济者，盖误滥也。丽地自有马邑山，故名马韩也^{[7]38}。一然在《纪异》第二《卞韩·百济》中也强调“古贤（指致远）之说为是”。再如，朝鲜李承休所著《帝王韵记》中的《高句丽纪》，亦将马韩置于高句丽首都王俭城（即今平壤），显然也是受了崔致远、金富轼的影响。随着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考古学的发展，对崔致远的说法本应有科学认识，但仍有学者将崔致远的说法奉为信史，从而掩盖了历史的真实面貌。例如，韩国学者尹乃铉在1986年11月12日的《朝鲜日报》上发表文章说，现今的平壤地区即是古代的马韩之地，并以此为据，认定古朝鲜以及汉乐浪郡的位置不在平壤地区而在中国的“满州”。实际上，各种迹象表明，百济之地即三韩中的马韩之地，新罗之地即辰韩之地，六加耶之地即卞韩之地。崔致远的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崔致远的错误不仅表现在关于高句丽之地即为马韩故地等这一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对百济、高句丽全盛时期疆域的叙述上，而后者对后人的误导亦颇为明显。例如，朝鲜史书《增补文献备考》云：

国史终百济之世，未尝有侵挠中国者，则辽西、越州以何时为百济所略有？然而非但新、旧《唐书》、《文献通考》著焉。崔致远《上唐太师侍中状》云：“高丽、百济全盛之时，强兵百万，南侵吴越，北挠幽燕齐鲁，为中国巨蠹。”然则，辽、越之为百济一时之有者无疑，而东史特逸其事耳。

这段叙述不仅肯定了崔致远的相关说法，而且还以两《唐书》、《文献通考》为据，进一步证明了崔氏说法的可信性。显然这种做法也是错误的。《旧唐书·百济传》云：“百济国，本亦扶余之别种，尝为马韩故地……东北至新罗，西渡海至越州，南渡海至倭国，

北渡海至高丽。”^[13]《新唐书·百济传》云：“百济……西界越州，南倭，北高丽，皆逾海乃至，其东，新罗也。”^[14]两《唐书》的记载，与崔致远的说法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只要略通汉语的人，是不会把越州（今浙江绍兴）、倭国等看作是高句丽或百济领域的。至于《文献通考》的记载，更是不可靠的说法。其云：“晋时，句骊既略有辽东，百济亦略有辽西。”^[15]只要大致了解中国辽西的历史，就不会相信百济曾略有辽西这样的历史认识。但是，有些学者却将“百济略有辽西”当成是真实的历史^[16]，这种看法的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应是《百济史》的作者文定昌。他在书中编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历史神话，认为“成长于韩半岛西南海岸的百济国，往西攻取中国的河北、山东、河南和扬子江口的吴越等诸地区而统治了三百年间；往东建立了以应神朝倭国为分国而支配数个世纪。”^[17]关于百济不曾略有辽西之事，中国学者已做出中肯分析，此处不述^[18,19]。

(2) 金富轼对于前人的文献史料常常有所“修订”和删节，对历史认识的准确性制造了障碍。

一是金富轼删节史料的情况较多，如《三国史记》载：“帝御师进至辽水，众军总会，临水为大阵。我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济。帝命工部尚书宇文恺造浮桥三道于辽水西岸。既成，引桥趣东岸，短不及岸丈余，我兵大至。隋兵骁勇者争赴水，我兵乘高击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众。麦铁杖跃登岸，与钱士雄、孟金叉等皆战死，乃斂兵引桥，复就西岸。更命少府监何稠接桥，二日而成，诸军相次继进，大战于东岸，我兵大败，死者万计。诸军乘胜，进围辽东城，则汉之襄平城也。车驾到辽，下诏赦天下，命刑部尚书卫文升等抚辽左之民，给复十年，建置郡县以相统摄。”^{[10]246}其史料来源于《资治通鉴》：“上始御师，进至辽水。众军总会，临水为大陈，高丽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济。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谓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岂能然艾灸頰，瓜蒂歃鼻，治黄不差，而卧死儿女手中乎！’乃自请为前锋，谓其三子曰：‘吾荷国恩，今为死日！我得良杀，汝当富贵。’帝命工部尚书宇文恺造浮桥三道于辽水西岸，既成，引桥趣东岸，桥短不及岸丈余。高丽兵大至，隋兵骁勇者争赴水接战，高丽兵乘高击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众。麦铁杖跃登岸，与虎贲郎将钱士雄、孟叉等皆战死。乃斂兵，引桥复就西岸。诏赠铁杖宿公，使其子孟才袭爵，次子仲才、季才并拜正义大夫。更命少府监何稠接桥，二日而成，诸军相次继进，大战于东岸，高丽兵大败，死者万计。诸军乘胜进围辽东城，即汉之襄平城也。车驾渡辽，引曷萨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观战处以慑惮之，因下诏赦天下。命刑部尚书卫文昇、尚书右丞刘士龙

抚辽左之民,给复十年,建置郡县,以相统摄。”^[20]其删节非常明显,给后人的阅读研究造成诸多不便,容易产生曲解甚至误解。

二是有意地“修改”史料。如果说,金富轼删节史料有可能是抄录过程中的疏忽,而“修订”史料则是有意为之了。这种情况出现较多,比如关于“王莽朝记事”首见于《汉书·王莽传》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高句丽琉璃明王三十一年)^[21],因其记载基本与高句丽有关,金富轼将其纳入《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时进行了明显的“技术处理”。^{[10]181}这种改动导致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发生很大歧义。大多数学者认同《三国史记》的记载,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刘恋认为王莽摄政(公元5年),或建国元年(公元9年)诏封朱蒙为高句丽侯,然后命其出兵“伐胡”,直至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才发生严尤杀朱蒙和王莽下诏贬高句丽之事,所以朱蒙实死于公元12年,而高句丽迁都集安如果在琉璃王二十三年,就应为公元33年^[22]。刘子敏赞同朱蒙死于公元12年的说法,认为在朱蒙被杀之前,琉璃明王仅是“摄政”,琉璃王迁都之地,不是今集安的国内城,而是霸王朝山城,只是到了大武神王在位十一年(公元28年)之后不久,才将首都由今霸王朝山城(尉那岩城)迁到了原西盖马县址,即后来的国内城所在地^[23]。李大龙曾对《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篡改王莽诱杀高句丽王的记事导致记载出现巨大差异进行过详细辨正,也认为这是作者金富轼的有意改动所致^[24]。

三是金富轼对史料缺乏去伪存真的辨析过程,对一些史料缺乏融会贯通的理解,致使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混乱现象。《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慕本王二年(公元49年,东汉建武二十五年)条搬用了中国史料,记载了高句丽“遣将袭汉北平、渔阳、上谷、太原”的事。应该说,这种记载是荒唐的。在东汉初期,上述四郡的北部为乌桓、鲜卑的居地。据《后汉书·祭彤传》载,祭彤于建武十七年拜为辽东太守,曾于建武二十一年袭击了辽东的鲜卑骑兵,并于建武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鲜卑,示以财利,其大都护偏何遣使奉献……其异种满离、高句丽之属,遂骆驿款塞。”此事《后汉书·光武纪》则载为:“二十五年春正月,辽东徼外貊人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辽东太守祭彤招降之,乌桓大人来朝……夫余王遣使奉献。”大概是上述记载中出现了“貊人”的缘故,被范晔误认为这“貊人”就是高句丽,于是《后汉书·高句丽传》就出现了“二十五年春,句骊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而辽东太守祭彤以恩信招之,皆复款塞”的记载,实际上,《后汉书》所载的“寇”前述四郡之“貊人”,是鲜卑、乌桓等,而并不是高句丽。

从《高句丽本纪》所载慕本王其人来看,是一个“为人暴戾不仁,不恤国事,百姓怨之”的国君,在位六年即为近臣杜鲁所杀。这样的国君,怎么能进行寇袭太原这样的远征?范晔的书已经错了,这个错误为金富轼所接受,这就是明显的以讹传讹了。但遗憾的是,今天有些学者在叙述历史时不去考察事情的真相,便以《三国史记》作为根据,轻率地主张彼时高句丽将其领土扩张至医巫闾山一带^[25]。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

三、《三国史记》关于高句丽的记载给后世造成误解

前文已述,《三国史记》和其后的《三国遗事》所记之“三国”,即指鼎足于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政权。从此之后,“三国时代”便成为朝鲜半岛历史认识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包括高句丽在内的三个政权同属朝鲜古代国家。而当今学界围绕高句丽问题存在的分歧与这种认识有密切关系。

关于金富轼的“高句丽观”,笔者曾撰文进行分析^[26]。他在《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将高句丽的建国看成是“乱世英雄”所为,是“僭窃名位”,在箕子朝鲜的故地建立起来的一个居于“中国东北隅”的政权。其发展过程,是“侵其封埒以仇之”,“入其郡县以居之”,不断侵蚀中原王朝东北边疆郡县的扩张过程^{[10]273}。金富轼对高句丽政权性质的认识是十分明了的。

金富轼将高句丽并列于百济、新罗,成为“三国”,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金富轼在《进三国史记表》中明确说,所记为“海东三国”,“海东”自然是“大海之东”之意,也就是说,“海东三国”之界定是以地域而论的,那么写“海东”历史,将高句丽与新罗和百济并举,是无可厚非的。其二,作为高丽国王的御用文人,他不能违背高丽王朝自诞生以来就已确定下来的北进政策和基本精神。早在王氏高丽建国之先就制造了一个“先操鸡,后博鸣”^{[10]555}的神话,表明了高丽欲以铁圆为中心,南取鸡林,北抵鸭绿江流域的领土愿望,并以高句丽继承者自居,取国号为高丽,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从新罗那里夺取政权制造舆论,争取人心,另一方面,是为实现其北进作好铺垫。在撰写国史时,虽然金富轼将“以新罗为中心”作为一条最重要的思路,但毕竟不能面对彼时高丽王朝业已将高句丽的最后首都定为“西京”,并将其领土扩张到鸭绿江南岸的现实,而将高句丽排除于“国史”之外,这也就很自然地将所谓的“三国”作为“国史”的整体来加以对待了。其三,欲使“茫然不知其始末”的“吾邦之事”明晰,自然是要依照当时高丽所领地

域的范围来写,所以金富轼将高句丽的历史写入“国史”之中,是势所必然。

在《三国史记》的许多具体记述中,很少出现历代中原政权或中国边郡反分裂的统一战争为不正当战争的说法,这表现了一个正直的历史学家所特有的“才”、“学”、“识”。但是,金富轼毕竟是高丽国王的御用文人,无论从阶级还是时代的局限性来看,金富轼不可能用彻底的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去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与现实的矛盾统一现象的。也正因为金富轼将三国中的高句丽纳入了“国史”的范围和系列,使人们对高句丽历史归属的真实面貌在一个很长时间里看不清楚,以至于在认知中存在差异甚至争议,而要弄清这一问题,必然要认真回顾历史才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无论从考古还是文献所提供的资料来看,我国中原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古代居民曾接连不断地向东北亚流动。从史书记载看,早在传说时期,东北亚地区的原始民族同中原地区就建立了朝贡关系。据《竹书纪年》、《大戴礼记》、《逸周书》等古书的记载,在虞舜“以天德嗣尧”、“有禹代兴”、成汤与文王“率受天命”之时,中原地区皆“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之族皆远道“来服”。至少在商朝晚期,东北亚地区就已经从原始人群中分化出了诸如肃慎、秽人、良夷(即乐浪夷)、发人(即貊人)、高夷等不同的民族,而这些古族在周初就与周天子保持着臣属关系,因而,周武王在灭掉商朝后郑重地宣布“肃慎、燕、亳吾北土。”^[27]所谓“燕”,指的是今燕山南北地区;“亳”即“发”、“貊”,指的是分布于我国古辽东地区的貊人;而“肃慎”,在古书中亦写作“息慎”或“稷慎”,是分布于现在我国的延边地区、黑龙江省东部地区以及朝鲜半岛东北地区、俄罗斯滨海地区直达黑龙江下游地区之我国古代民族。周天子的郑重声明,为我们考察东北亚古族古国的历史问题明确了方向。商周时期我国中原王朝同东北亚地区的关系都颇为密切,当商末周初改朝换代时,大批的殷人及东部沿海地区的古东夷人或由陆路,或由海路,向东北亚地区迁徙,出现了像箕氏朝鲜这样的古代国家。我国学者认为箕子集团是由海路逃亡到韩半岛南部的,到了春秋时期,其后裔才率部北上,至大同江中下游地区安居下来,并改国号为“朝鲜”^[28-30]。“朝鲜”之地本来是良夷的分布区,“箕子之国”迁至此处之后,与良夷融合,形成了古朝鲜族,亦即古书所说的“朝鲜蛮夷”。箕子之国起初是西周的诸侯国,但由于纣王之子武庚伙同东夷诸族发动的叛乱为西周镇压,加上后来东胡人占领了辽西地区,中断了箕子之国同中原的联系,包括“朝鲜”在内的东北亚古族古

国进入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阶段。到了战国时期,燕人东扩,古朝鲜为其征服,成为燕国的附庸,在此之前,箕子之后裔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尊周”意识^[31]。进入汉朝,取代箕氏朝鲜的卫氏朝鲜与汉“约为外臣”^[32],双方依然保持着藩属关系。卫氏朝鲜灭亡,汉四郡建立,朝鲜半岛北部便纳入了天子的直接辖区^[33]。

高句丽最初是从辽东郡沸流水的高夷中分化出来的民族共同体,汉昭帝将玄菟郡侨置于辽东郡塞外之地,其郡治高句丽县置于高句丽族的西北地区(今辽宁省新宾永陵镇之南),将高句丽、卒本夫余、梁貊等三个少数民族地区纳入高句丽县的辖区。及朱蒙率领一部分夫余人逃亡到卒本夫余,建立政权,便以此为依靠力量,威服或征服了沸流国等几个高句丽部落,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彼时他们依然在高句丽县的直接管辖之下,并接受西汉皇朝的册封。王莽篡政后,朱蒙被诱杀,高句丽彻底叛汉,并趁王莽对东北边郡及少数民族的管辖松弛之机,不断发展其割据势力,最终瓦解了玄菟郡的三个县,将首都迁至玄菟郡故县西盖马(国内城),以此为根据地,进行扩张,至太祖王高宫时,形成了五部格局。后来,将势力发展到夫余、东沃沮、北沃沮的部分地区、东秽以及辽东等地,最后占领乐浪、带方二郡故地,同百济和新罗争夺朝鲜半岛。隋唐之所以对高句丽采取武力解决的办法,主要原因是在隋唐君臣眼里,高句丽之地本箕子之国,汉家边郡,将其收复属天经地义之事,相关的论述在两《唐书》的《高丽传》中皆有明确记载。对此,金富轼在《三国史记》中并没有提出异议。其实,高句丽的疆域是古代中国固有之土地,在后来辽朝君臣的心目中也没有发生变化。辽圣宗于公元993年遣东京留守萧逊宁进攻高丽,就是因为高丽侵夺了高句丽旧地。契丹人认为,高丽是从新罗脱胎出来的国家,而高句丽之地的拥有权是在辽朝这里,高丽对高句丽故地的侵蚀是毫无道理的,辽朝有责任将失去的土地收回来。彼时同萧逊宁谈判的高丽大臣徐熙以偷换概念将高氏高丽(高句丽)同王氏高丽混为一谈。他针对萧逊宁关于高句丽故地拥有权的谈话而辩解说:“我国即高句丽之旧,故号高丽,都平壤。若论地界,上国之东京皆在我境,何得谓之侵蚀乎?且鸭绿江内外亦我境内,今女真据其间,道路梗涩,甚于涉海,朝聘之不通,女真之故也。”^[34]双方的争论并没有继续下去,令人惊讶的是,作为战争胜利者的辽朝,为了争取高丽脱离大宋而站到自己这一边,竟然将清川江两岸的数百里之地赐与了高丽。后来辽圣宗虽然对此深为后悔,但始终没有将失去的土地要回来。徐熙的说法,代表了高丽王朝历代君臣的“高句丽观”,这种“高句丽观”在新旧《五代史》和《宋

史·高丽传》中想当然地被肯定下来。两部《五代史》将高句丽王说成了王氏高丽的“前王”，《宋史》亦说“权知国事王建”是继承了“高氏之位”。在《三国史记》中，我们没有发现上述中国史书中的错误说法，但金富轼将高句丽写进了高丽的“国史”，并未客观地辨析两“高丽”的本质区别，从而使后人对相关历史的误解越来越深了。

应该说，作为朝鲜半岛第一部正史文献，《三国史记》的史学价值是不能否认的，是我们研究古代中国、朝鲜，乃至东北亚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然而，对其中的史料，我们应该本着客观的态度，辩证

取舍。对于其所遵循的编纂体系，以及书中所体现的历史观，笔者认为有两点应该注意：一是，将“三国”并立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因素，不能局限于表面的现象而忽视金富轼的历史认识体系，从《三国史记》的整体来看，金富轼虽然也将两朝鲜纳入国史，但重点历史线索还是三韩——新罗——王氏高丽，这应是朝鲜或韩国古代史的发展主线，而由于王氏高丽已经领有包括高句丽故地在内的领域，所以其叙写体系是可以理解的。二是，对于金富轼的历史观应该客观认识，尤其是“事大史观”与“渤海史观”，对此笔者将另文探讨。

参考文献：

- [1] 刘子敏. 几条关于朱蒙记事史料的研究[J]. 博物馆研究, 2002(2).
- [2] 朴灿奎. 《三国志·高句丽传》研究[J].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 [3] 耿铁华. 王莽征高丽兵伐胡史料与高句丽王系[J]. 北方文物, 2005(2).
- [4] 李大龙.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史料价值辨析[J]. 东北史地, 2008(2).
- [5] [朝]孙英钟. 高句丽建国年代的再探讨[J]. 文一介, 译. 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 1991(1).
- [6] 姜维公. 从《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看金富轼对海东三国系年的安排[C]. 高句丽史新研究.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6.
- [7] 刘子敏. 谈谈金富轼对王莽记事的篡改[J]. 北方文物, 2007(1).
- [8] [韩]精神文化研究院译注. 三国史记[M].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 1998.
- [9] 刘子敏, 苗威. 《三国史记》详注及研究.“东北工程”结项项目.
- [10] 金富轼. 三国史记[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3: 335.
- [11] 一然. 三国遗事[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3: 30.
- [12] 高丽图经(卷 8:《人物》金富轼)[M]. [韩]亚细亚文化社, 1972: 45.
- [13] 旧唐书(卷 199: 上东夷传·百济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5328.
- [14] 新唐书(卷 200: 东夷传·百济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6198.
- [15] 文献通考(卷 326)[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56.
- [16] 金宪淑. 百济掠有辽西记事初探[J]. 延边大学学报, 2000(2).
- [17] [韩]文定昌. 百济史[M]. 汉城柏文堂, 1975.
- [18] 刘永智. 百济略有辽西辨[J]. 学术研究丛刊, 1983(4).
- [19] 刘子敏. 驳“百济掠有辽西记事初探”[J]. 延边大学学报, 2001(3).
- [20] 资治通鉴(卷 181: 大业八年二月条)[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5661.
- [21] 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始建国四年条)[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4066.
- [22] 刘恋. 访高句丽早期遗址五女山城[J]. 朝鲜史通讯, 1981(3).
- [23] 刘子敏. 朱蒙之死新探[J]. 北方文物, 2002(4).
- [24] 李大龙. 关于高句丽侯驎的几个问题[J]. 学习与探索, 2004(5).
- [25] 朝鲜全史(第三卷汉译本)[M]. 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8: 63.
- [26] 苗威. 从金富轼的高句丽观看高句丽政权的性质及其历史归属[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4(4).
- [27] 徐中舒. 左传(鲁昭公九年条)[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274.
- [28] 蒙文通. 周秦少数民族研究[M]. 龙门联合书店, 1958.
- [29] 罗继祖. 辰国三韩考[J]. 北方文物, 1995(1).
- [30] 刘子敏. 关于古“辰国”与“三韩”的探讨[J]. 社会科学战线, 2003(3).
- [31] 三国志(卷 30:《东夷传》注引《魏略》)[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850.
- [32] 史记(卷 115:《朝鲜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2985.
- [33] 苗威. 古朝鲜研究[M]. 香港亚洲出版社, 2006.
- [34] 续资治通鉴(卷 16: 淳化四年正月条)[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384.

(下转第 49 页)

参考文献:

- [1] 王威海. 韦伯:摆脱现代社会的两难困境[M]. 沈阳:辽宁出版社,1999.
- [2] 林婷. 关于“科层制”与“官僚制”的概念辨析[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2).
- [3] 安东尼·唐斯. 官僚制内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4] 韦伯. 儒教与道教[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 [5] 冯天瑜,周积明. 中国古文化的奥秘[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 [6] 王怡. “屈君伸天”与皇权专制——董仲舒法律思想新论[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4).
- [7] 王亚南.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8] 韩庆祥. 现代性的建构与当代中国发展[J]. 天津社会科学,2004(3).
- [9] 阿尔蒙德. 当代比较政治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 [10] 何显明. 现代理性官僚制的理性审视[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4(6).
- [11] 盖伊·彼得斯.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 [12] 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 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公营部门[M].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Historical Impacts of Bureaucracy and Solutions of Chinese Government

GONG Jian-hua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School, Guangdong 524088)

Abstract: Traditional bureaucratic system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Pre-Qin period is highly centralized family bureaucratic system. It does not have scientific, rational and legislative spirit of the modern bureaucratic system. It is deeply rooted that the residue of rule by man has impacts o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eople's concepts. Although the western new management doctrine urges the rejection of modern bureaucratic system,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bureaucratic system, the advantages of modern bureaucratic system are significant. Because China's market economy foundation, the rule-of-law environmen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civil society don't yet meet condi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bureaucratic system, the urgent task is not to imitate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model, but based on social realities in China, resolutely reject the traditional bureaucratic system, learn from reasonable elements of the modern bureaucratic system, and thus innovate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raditional bureaucratic system; Modern administration system; Defects; Comparison

[责任编辑:箫姚]

(上接第 38 页)

Study on Historical Influence of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MIAO Wei

(Department of History,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133002)

Abstract: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is the first official and formal historical document in Korea, and it is an important document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s in Choson peninsula. In recent years, in the wake of profound study on ancient history of Northeast Asia, scholars put much emphasis on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However, the systematic-elaboration about its historical influence is non-existent yet. Correct and objective comprehension about the related records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both Choson history and anci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Choson. Specifically speaking,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has deeply influenced the compiling of academic Korean history. Meanwhile, the incorrect records in this document may mislead the historical study for offspring.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combines Koguryo, Paekche and silla simultaneously in Korean official history, also affects the comprehension of history by late generations.

Key words: Samguk-Sagi; Kim Bu-Shik; historical influence

[责任编辑:孟青]